

邵丽： 挂职对我的创作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

本报记者 宋燕

作家简介

邵丽

当代著名女作家，生于1965年11月，现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著有《明惠的圣诞》《我的生活质量》《城外的小秋》《第四十圈》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

图书简介

《挂职笔记》

作家邵丽前些年曾在河南省汝南县挂职两年，任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笔记》是她深入基层之后的最新创作成果。全书分为上下两辑，在上辑里，叙事者通过挂职副县长的视角，以相对独立和客观的立场来理解人们的生存状态；在下辑里，第一人称开始隐去，文本围绕一系列人物而展开，他们处在不同的城乡关系链条中，有着各自的具体生活。

在本书中，邵丽以沉着的笔调，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心态，写出了困惑和焦虑，也写出了长存于世的人性光辉。



作家邵丽的中短篇小说集《挂职笔记》2017年9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日，在该书的读者见面会上，作家张楚及本书作者邵丽出席活动，与各界读者一道分享了《挂职笔记》的创作体会及对于乡土文学的看法。

邵丽前些年曾在河南省汝南县挂职两年，任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笔记》是她深入基层生活之后的最新创作成果。在本书中，邵丽以沉着的笔调，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心态，写出了困惑和焦虑，也写出了长存于世的人性光辉。她的写作并不完全借助于故事变化和情节冲突，而是冷静地使用有节制的笔触，写出人性中的曲折和波澜。

谈及自己的挂职经历和书写乡土文学作品的体会，邵丽说：“写这些小说时，我其实面临着内心的巨大焦虑，就是我的写作要转型。这次下去挂职，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契机，让我看到了文学的本质，那就是要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我重视那种带有泥土气息的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语言，当你深入基层，与普通民众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他们的智慧、幽默。在中国，几千年来，苦难都是靠这种智慧和幽默消解的。它无所谓高级或者低级，也无所谓对与错，我们要正视它、重视它，这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张楚读过许多邵丽的作品，他认为，邵丽前期的作品委婉一些，后期一系列跟挂职相关的小说非常有力量，跟前期作品的风格有很大的区别。张楚说：“这两年中短篇小说还是非常繁荣的，这两年我最喜欢的两篇小说，一篇是《世间已无陈金芳》，另一篇是《第四十圈》。《第四十圈》从不同角度、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立体叙述了一宗凶杀案，但是案件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案件之外底层小人物的众生相：每个人都在生活的炼狱中苦苦追求着他们所理解的幸福，这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1 十七八岁开始写作 三十多岁进入专业作家队伍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

邵丽：我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时不仅物质匮乏，我们的精神生活几乎也是白纸一张。当时家里有一本《本草纲目》，被我们兄弟姐妹翻得稀烂。那时若有可能借到一本书，我们会争相传阅，为了赶时间，晚上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彻夜地读。

我的父母都是基层干部，我跟着他们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后来我想，虽然我不能到达远方，但是阅读却可以把我送往远方，阅读是我打开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

因为偏科，抵触数学，高中毕业时我只考上了一所财会专科学校。我高中毕业开始写各类文章，包括开始偷偷地写小说，那个年龄崇拜文学，对所有能写文章的人都看得很神圣。

毕业后到机关当了公务员。从十七八岁开始写作，到三十多岁进入专业作家队伍，虽然这中间看起来中断了十几年，但是哪种人生都不是虚度的。我在机关公务员岗位上读了很多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为专业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算是一个幸运的人，通过写作找到了一条人生成功的路径。也可以说文学让我有了第

二种生命，靠着文学铺就的路从一个城市走向另外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走向另外一个国家，用文字行走，把自己的路延伸到千里万里。

记者：《挂职笔记》之前是一篇短篇小说，现在您又推出了这部《挂职笔记》的中短篇小说集，挂职这个经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邵丽：我2004年到2006年在驻马店市汝南县挂职两年，回来之后，经历了三四年的沉淀。这三四年刚好是我小说的一个转型期。刚开始时，我写一些很唯美、浪漫的文章，后来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作家总是重复自己就写不下去了。沉寂了几年，然后我开始试着用一种非虚构的手法写一些东西，这种尝试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可和业内人士的认可。我用十来年的工夫写了这一挂职系列。

记者：您说挂职对您的写作有着颠覆性的影响，这个颠覆性的影响指的是哪些方面？

邵丽：整个创作过程，可以说自己原来那种叙述方式和小说结构都有了改变。挂职前，我经历了很长一段焦虑期，不知道自己的写作该往哪个方向走。但是我下去之后，贴近生活，面对现实，于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契机。

2 我写的不是 官场小说

记者：提到《挂职笔记》，包括您的很多作品，很多人说写的都是官场，属于官场小说，但是您否认官场小说的说法，为什么？

邵丽：我不是拿着写官场小说的态度去写的，是站在文学的立场写的，写的是人性，是社会，是人的情感，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感情上来说，我觉得和官场小说还是隔着很远的距离。

记者：《挂职笔记》写了与挂职有关的人物故事，它虚构和非虚构的比例是多少？因为您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感觉跟真的一样。

邵丽：那只是一种写作的方式，其实虚构占90%，真实的有10%的成分。

比如《人民政府爱人民》，当时我一个朋友在某县当县长，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拿了一封信，说这是我们县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写的，她写信质问我“我中学的费用是县上给的，我高中的费用也是县上给的，为什么我上大学了反而县上不管了？”她不是用一种寻求同情的方式，而是用非常强硬的态度质疑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政府也解决不了。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规定，大学已经不是义务教育了，需要大家赞助一部分，政府确实没这部分资金。这样一封信，我觉得很有意思。看完这封信后，我就写了一篇关于上访教育体制的小说，主要写信访问题，写一个小女孩因为没有拿到学费，就自己出去打工，结果打工的时候失踪了。然后她父亲不停地上访，一个县里面的四大班子都围绕这一个人，不管是什么场合、什么时候，他不停地到各个级别的部门上访，他说我什么也不要，政府一定得还回我女儿。这个故事虚构的成分占90%。

记者：《刘万福案件》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引起了轰动和热议，也获得了许多奖项。在《刘万福案件》中，你讲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又天然蕴含着悲剧的故事。刘万福村里的七十多口人到县委送锦旗，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他三次生命。当你深入到故事的内核，却发现故事本身的发展逻辑，从而揭开了刘万福“三死三生”的演进过程。这个故事是你挂职期间亲身经历的？作为一名作家，你是如何处理素材和小说之间的关系？

邵丽：《刘万福案件》包括《第四十圈》，都是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事，我也都见过当事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所以我当时听了这个事之后，也觉得特别震撼。至于小说和素材的关系，我觉得一个是表，一个是里，小说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内里，还是事物本身的逻辑和它的真实性。就刘万福这个案件来讲，我没有更多的演绎。其实我主要不是想写故事，而是写我们的困惑。在基层，尤其是在乡村，刘万福这样的人太多了，这也不是让我们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产生刘万福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社会环境和人们麻木不仁的态度。

记者：《北区的河》与《城外的小秋》，是对当代中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裂隙以及故乡陨落真实描摹，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邵丽：我非常留恋昔日那些自然的炊烟袅袅的村落，可是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不可阻挡的。记得一次去一个县里搞调研，我说了我的观点，那个县的县委书记问我，那样的村庄也许你来参观一下觉得是美的，让你住上三天，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排水系统，苍蝇漫天飞舞，你能住下来吗？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矛盾、痛苦、尴尬的发展过程。农村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乡村牧歌式的回忆，大部分都是想象出来的，即使是真正的农村，现在也在城市化。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当然，我们要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把我们对乡村这种怀念的情绪表达出来。